

摘要

本研究以日本與台灣的少年犯罪電影為研究對象，透過影像分析，探討兩國在少年犯罪電影的描寫有何不同，並進一步分析影像作品如何反映其社會背景、家庭結構與教育制度。近年來，台日兩國對非行少年皆有高度關注，日本法務省連續兩年將「非行少年」列為《犯罪白書》的主題，而台灣則根據《警政統計通報》指出，自 2014 年以來少年犯罪率持續 8 年不斷上升。本研究選取 2000 年代以後的日本電影《誰も知らない》《告白》《白夜行》《渇き》《友罪》與台灣電影《九降風》《艋舺》《陽光普照》《無聲》《壞男孩》共十部作品為分析對象。電影中所描寫的非行少年，多數來自脆弱家庭¹，家庭是導致他們犯罪的主要原因。然而，除了家庭因素以外，日本與台灣電影在犯罪動機、犯罪類型、敘述故事的角度、家庭與社會所背負的責任等方面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。

首先，在犯罪原因的描寫，日本電影強調家庭的失調為少年非行的主因，尤其是父母的冷落、虐待、情感疏離等情況，孩子更加可能走歪。反觀台灣電影，除了家庭因素外，更強調社會與群體所造成的影響。例如，學校教育的失靈、教師的漠視、朋友間的集團壓力與幫派文化的誘惑，往往成為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推力。其次，在犯罪類型上，日本電影多為單獨犯罪的事情節，展現少年與社會的脫節與社會的孤立，而台灣電影則以集團犯罪為主，強調「朋友」、「團體」等因素所造成犯罪。此外，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視角呈現也有所差異。日本電影常以加害者的視角切入，深入挖掘其內心的痛苦與掙扎，試圖讓視聽者理解其犯罪行為背後的原因。台灣電影則依作品有不同的視角，不僅描寫加害者的背景，也關注受害者的創傷與社會的冷漠。在責任歸屬的描寫上，日本電影較偏向將非行歸因於家庭，尤其是父母的失職與家庭的失調將對孩子造成重大的影響；而台灣電影則將家庭、學校與社會整體皆視為潛在的責任者，認為教育者、制度、媒體甚至整個社會氛圍皆有可能促成非行的發生。

透過這樣的跨文化比較分析，影像作品不僅重現社會現象，更透過敘事方法、角色塑造與不同視角展現，進而去影響觀眾對於非行少年的認識與態度。日本電影強調加害者的人性描寫與更生困難，呈現社會排斥的殘酷；台灣電影則揭示非行背後的多重壓力與系統性缺失，試圖喚起社會集體的責任感。本研究的貢獻在於，透過影像的比較與分析，呈現出台日社會對於少年非行的不同理解，透過電影等文化產品的力量，促進大眾對青少年議題的同理與反思。同時也提出，影像作品雖有可能強化刻板印象，但也具有挑戰社會偏見與引發輿論的潛力，未來應更進一步進行多國家的比較研究，深化對於少年犯罪的理解。

¹脆弱家庭指的是家庭因貧窮、犯罪、失業、物質濫用、未成年親職、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、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，造成物質、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的脆弱性，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。